
真理的追求

ZHENLI DE ZHUIQIU

1990年7月创刊—1991年12月合订本

真理的追求杂志社

《真理的追求》(1990年7月—1991年12月)

总 目 录

(题目后面括弧内前一数字是总期数，后一数字是页码)

· 党 建 ·

把学习焦裕禄的活动认真推广开来	本刊评论员 (1·2)
论“钱、权交易”	苏沛 (2·2)
纪念许明	梅行 (2·26)
略谈奉献	史崇 (2·30)
谈“冲决网罗”	朱子初 (3·26)
短评：重新学习周恩来对雷锋的题词	(4·2)
“报喜也要报忧”及其他	闻道 (4·18)
反腐败斗争必须坚决和持久	本刊评论员 (6·2)
我们的愿望	
——新年致读者	本刊编辑部 (7·2)
谈共产党人的生活方式	林雨润 (7·3)
重提“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学风小议	李文海 (7·13)
知识分子党员党性修养的优势与劣势	唐秉仁 罗小凡 刘普生 (7·24)
蟋蟀、皇冠、宾馆及其它	王继忠 (7·封三)
说“考验”	方一心 (8·2)
反腐防变	任平生 (8·18)
列宁不习惯住大房子	陈东 (8·19)
“朽”与“不朽”	
——纪念一位老共产党人	何淡夫 (8·23)
转载：在斗争中建设共产主义执政党	
——兼析“斗争哲学”	牛星熙 (9·18)
读《张闻天和他的子女》有感	苏沛 (9·28)
党风也要“淡化”吗?	柳运华 (10·封三)
如此“社会主义研讨班”!	于逸竹 (11·30)
“有钱难买反对自己意见的人”	张鹏发 (11·31)
把学习焦裕禄的活动向前推进一步	本刊评论员 (12·2)
共产党员不能雇工剥削	林雨润 (12·5)

列宁反腐败斗争的理论与实践	姬金铎 (12·19)
杂感二题	徐直仁 (12·封三)
抓紧端正党风	梅行 (13·2)
党的领导要通过执政来体现	宋廷同 (13·7)
认清反腐败斗争的阶级实质	王兆铮 (13·18)
从晏婴不迁新居想到的	何微 (13·封三)
少点“关系”意识	李炎溪 (14·31)
“上面做起”与“下面配合”	沈水荣 (14·封三)
学风杂议二则	张德成 (16·9)
略谈革命传统教育	陈应 (16·28)
论反腐败斗争的重点	林雨润 (18·2)
发挥职工主人翁作用要做到“四心”	中共潍坊市委研究室 (18·27)
信耶稣与信共产党	邴化众 (18·31)

• 政 治 •

回顾毛泽东关于防止和平演变的论述	逄先知 (1·5)
关于自由的札记	朱群 (1·25)
关于自由的札记 (续)	朱群 (2·16)
读报杂记	闻道 (2·封三)
西方在对外关系上的“政治挂帅”	钟无忌 (3·12)
社会主义社会中的阶级斗争是一个客观存在	思铭 (3·14)
莫把腐朽当新奇	沈小石 (4·30)
转载：张闻天：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政治与经济关系问题的提纲 (1961年8月14日)	(4·封三)
政治与经济的关系浅释	陈乐文 (5·2)
行贿犯罪的新特点及其法律探讨	周治清 (6·8)
谈冲出“圈圈儿”	朱青 (6·30)
从落后与挨打说起	骆冰 (6·封三)
“淡化”与“浓化”	骆冰 (7·15)
“政治挂帅”再认识	陈守礼 (7·17)
在民主问题上划清两个界限	蔡一润 (7·21)
也谈“学术批评”与“政治批评”	刘谦 (8·29)
驳“政治多元化”	邱敦红 (9·11)
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在我国	黄晓瑜 (9·25)
论政策的立足点	徐学海 (9·30)
析“淡化政治”的两个论据	沈国权 (10·20)
中国的私营企业主是否已经形成一个资产阶级？	葛丁 (10·25)
私营企业主阶级的雏型已在我国形成	陆仁权 (10·27)

从阶级斗争学说的“发明权”说起	朱青 (13·13)
社会主义条件下的“主人”和“公仆”	王锦才 (13·26)
关于当前改革问题之我见	吴建国 (14·2)
改革与社会心理背景	鲍剑 (14·17)
我国私营企业主属于非完整阶级范畴	马原生 高健生 (14·25)
毛泽东防止和平演变思想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贡献	李捷 (15·6)
西方民主引进中国以后	苏沛 (15·19)
刘宾雁自演《人妖之间》	沈小石 (15·31)
改革与反和平演变	
——从严家其的改革主张谈起	李延明 (17·2)
现阶段私营企业主与资产阶级	心页 (17·25)
我国私营企业主属于非完整阶级范畴	
① 还是属于受限制的资产阶级范畴?	何祚庥 (17·30)
怎样才算有政绩?	王志富 (17·31)
读报杂抄	淡夫 (18·11)
“审时度势”一得	骆冰 (18·13)
商品经济意识的阶级性问题	邵平 (18·18)
也谈社会主义条件下的“主人”和“公仆”	
② ——与王锦才同志商榷	邸乘光 (18·23)

· 经 济 ·

亚当·斯密思想体系中，同情心和利己主义矛盾的问题	陈岱孙 (1·19)
光荣的爱国主义者陈岱孙教授	谷牧 (1·23)
清理整顿公司要善始善终	经叔平 (2·13)
转载：农民最满意和最不满意的问题	王伟平 (2·22)
就业“自我消化”质疑	长青 (2·31)
转载：商洛来信	(3·封三)
改革，不能取消公有制	
——评童大林同志的“新的设想”	朱群 (5·14)
七万农户的意见和要求是什么?	
——记芷江县的一次调查	湖南芷江县委政策研究室 (5·29)
为什么这么难办?	
——评乐清县柳市区的假劣电器案	闻道 (5·封三)
列宁的一个最后愿望	
——维护对外贸易垄断制	苏沛 (6·5)
“个体车辆”问题引发的思考	娲石 (6·26)
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的症结何在?	周光春 (7·8)

治理整顿见效的主因何在?	陈世宜 (8·6)
市场和市场经济辨析	许毅 (8·10)
怎样看商品经济的共性和特性?	
——与蒋一苇同志商榷	马滨 (8·12)
转载: 美国技术监督人员是怎样检查企业的?	(8·封三)
议搞活国营大中型企业	周光春 (10·2)
“和平演变”战略与经济	朱青 (10·5)
谈“资本输出”与“利用外资”	王宜民 叶茂楼 (10·12)
对《亚当·斯密思想体系中, 同情心和利己主义矛盾的问题》一文的理解与想法	关亚君 (10·22)
商品经济简析	常青 (11·9)
谈谈“资金市场”	许毅 (11·14)
计划经济与经济计划	张兴智 (12·16)
重提“姓社”与“姓资”	陈仲华 (13·31)
“产品经济”论质疑	朱青 (16·12)
庸俗生产力观点是十分有害的	张勤德 (16·18)
试析我国经济过热现象反复出现的深层原因	高光厚 (16·22)
对“产权”的几点看法	宗寒 (17·6)
转载: 问一问“姓社还是姓资”	秦思 (17·13)
读者来信: 《“产品经济”论质疑》读后感	(18·21)

· 哲学 ·

多元化理论评析	江崇廓 王凤生 (2·23)
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要“说真话”、“言行一致”	
——略谈周恩来的实事求是态度	许立群 (3·2)
求真、反对极端主义	
——周恩来哲学思考的两个鲜明特点	金冲及 (3·5)
不似哲学家, 胜似哲学家	
——要像周恩来那样运用哲学	石仲泉 (3·9)
民主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的本质区别	曹长盛 (3·18)
唯物主义基本观点是否定不了的	黄枬森 (3·24)
读《思想方法工作方法文选》的笔记	仲山 (3·29)
必须科学地分析和研究历史经验	胡绳 (4·5)
哲学魔术师怎样把老母鸡变成鸭?	许立群 (4·12)
民主社会主义的过去和现在(上)	殷叙彝 (4·24)
民主社会主义的过去和现在(下)	殷叙彝 (6·15)
简评几种“新学说”	孙乃民 常樵 (6·21)

“变”与“不变”谈话录	李军 左扬钊	(7·31)
差异·界限·转化		
——关于走极端的一点认识	陈明理	(8·31)
“马克思主义和孔子教义”		
——李一氓给蔡尚思的信读后	司马孺	(9·2)
表面文章改写不了历史		
——怎样看民主社会主义	许征帆	(10·16)
反历史主义的贫困		
——波普历史观简析	朱士群	(11·23)
马克思主义哲学革命批判本性的现实意义	张理海	(11·26)
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地位	于南	(12·12)
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		
——对毛泽东把人民内部矛盾作为主要矛盾的历史考察	施肇域	(12·23)
马克思主义不能无原则的“开放”	刘跃先	(13·29)
《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读后感	胡绳	(14·12)
抽象人道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的哲学基础	张启华	(15·14)
周恩来求真务实的思想方法	杨明伟	(18·7)
漫谈“古为今用”	李侃	(2·9)
真假精英古今谈	沈小石	(2·28)
鸦片战争150周年有感	陈元晖	(3·21)
“传统”小议	于逸竹	(5·22)
七十年与四十年		
——《日本侵华七十年史》序	刘大年	(5·9)
观“宝”杂记	于逸竹	(6·13)
发扬近代中国产业革命精神	汪敬虞	(7·10)
改天换地的150年	李侃	(8·14)
评读《必须科学地分析和研究历史经验》	王仲清	(8·25)
当今日本的历史意识走向		
——评石原莞尔研究“热”	良邑	(9·7)
简述资产阶级历史学家的阶级斗争观	张奇方	(13·22)
一样天灾两般情		
——新旧社会灾荒的历史对比	李文海	(15·27)
孙中山对中国国情的认识	刘大年	(16·2)
珍珠港参观随感	张海鹏	(18·15)

· 科 技 ·

当前我国科学技术工作中的六个问题	钱学森 (1·14)
“想当然耳”和“不求甚解”	何祚庥 (2·6)
马克思对自然科学的研究及其与《资本论》的关系	刘 炳 (7·26)
科技“面向”与经济“依靠”的辩证关系	许教新 (7·29)
中国历史上科学技术落后的外因是什么?	李明银 (8·20)
对我国科技事业的一些思考	钱学森 (11·2)
驳所谓“科学是生产力这一说法并不科学”	何祚庥 (16·6)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	冯丛林 (17·17)
“总需求”、“总供给”与自然界	徐学军 (17·22)

· 文 教 ·

郑板桥和“难得糊涂”	方一心 (1·28)
文化与经济、政治的关系	骞 叔 (1·30)
深圳文娱活动的一个创举	肖 慧 (1·封三)
“被混蛋称赞，不如战死在他手里”	左 迁 (2·11)
从“西体中用”说开去	董学文 (2·19)
什么是“美学的历史的”批评	
——马克思主义与文艺批评之一	陈 涌 (4·14)
高校加强社会实践的一个成功试验	章开沅 (4·28)
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任重而道远	何东昌 (5·4)
文艺批评的美学方面是不可缺少的	
——马克思主义与文艺批评之二	陈 涌 (5·23)
译著序言与导向	张玉中 (9·封三)
迷路的引路人	史 莽 (10·19)
元宵感言	魏 巍 (11·6)
我们要用什么思想引导青年作家?	左 迁 (11·16)
何物“文化整体转移”论	龚书铎 (11·19)
有感于娃娃作广告	何 微 (11·封三)
春夜偶识 (二则)	骆 冰 (12·28)
帮助青年学习马列原著的一些体会	郭必康 (12·30)
“二律背反”的乖离与背反	
——乱用术语例析	吴慧颖 (14·21)
建设社会主义文学的思考	刘白羽 (15·2)
文风絮语	何淡夫 (15·封三)
陈毅《感事书怀》诗之四：《七古 手莫伸》	(16·封三)
列宁：中国的理解 [诗]	孔繁斌 (17·封三)
由“自我推销”想到的	程 思 (18·30)

真理的追求

ZHENLI DE ZHUIQIU

要 目

- 把学习焦裕禄的活动认真推广开来……本刊评论员
回顾毛泽东关于防止和平演变的论述 …… 逢先知
当前我国科学技术工作中的六个问题 …… 钱学森
亚当·斯密思想体系中，同情心
和利己主义矛盾的问题 ……………… 陈岱孙
关于自由的札记 ……………… 朱 群

1990 1

本刊编辑宗旨与稿约

一、本刊坚持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原理，坚持实事求是学风。本刊致力于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和其他反马克思主义思想，以求巩固和加强社会主义的思想阵地。

二、本刊遵循党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为实现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的稳定发展而尽力。

三、本刊坚决贯彻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文章力求提高理论性，又有现实性，避免单纯讲理论或单纯讲实际。力求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对具体事物进行具体分析；应该赞扬者赞扬之，应该阐述者阐述之，应该批评者批评之。

四、本刊为综合性杂志，奉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提倡在不同的意见之间开展认真的讨论，以求逐步接近客观真理。反对不顾客观事实和不虚心探求客观真理的主观武断作风。尊重作者。尊重持科学态度的理论研究工作者、宣传、教育工作者、学者、专家和广大知识分子。本刊所发表的文章，都是作者自己的观点，不代表本刊编辑部的意见。

五、本刊提倡良好的文风。文章力求做到准确、简练、鲜明、生动，有的放矢，不尚空谈，力求做到与广大读者声气相通。

六、本刊登载的文章每篇一般以3000字为限，有的文章可以超过此限。欢迎投稿。来稿请寄北京市沙滩北街2号《真理的追求》杂志社（邮政编码100727）。刊登后酌致稿酬。限于人力，来稿一律不退，请自留底稿，如一个月后未接到采用通知，可自行处理。

主编（以姓氏笔划为序）：许立群、苏沛、李侃、陈涌、梅行。

副主编：余征

真理的追求

(月刊)

1990年

第1期

(总第1期)

7月1日出版

☆ 目 录 ☆

- 把学习焦裕禄的活动认真推广开来 本刊评论员 (2)
- 回顾毛泽东关于防止和平演变的
论述 逄先知 (5)
- 当前我国科学技术工作中的六个问题 钱学森 (14)
- 亚当·斯密思想体系中，同情心
和利己主义矛盾的问题 陈岱孙 (19)
- 光荣的爱国主义者陈岱孙教授 谷 收 (23)
- 关于自由的札记 朱 群 (25)
- 郑板桥和“难得糊涂” 方一心 (28)
- 文化与经济、政治的关系 魏 叔 (30)
- 深圳文娱活动的一个创举 肖 慧 (封三)

为了人民利益甘愿吃苦、甘愿献身的心，不可能真正学到焦裕禄精神。所以，我们应当自觉地锤炼一颗对人民火热的心，同以权谋私、官僚主义、贪图安逸、消极怠工等不良作风进行坚持不懈的斗争。抓住了这个根本，才能使学习焦裕禄的具体措施条条落实，真正学出实效来。”这些话，讲得极好，极为中肯。

90年代与60年代相比，干部队伍的情况已发生很大变化，群众的要求也不同了，我们必须从当前的实际出发，将学习焦裕禄的活动同端正党风政风、清除腐败现象结合起来。这里最重要的一点是：在广大干部中强调同歪风邪气作斗争必须具有坚决性，决不能手软、让步。你只要手软一下，让一点步，和一点稀泥，开一点口子，搞一点特殊，留一点面子，丑事坏事就无法制止，歪风邪气就会向你进攻，猛扑过来。有同志作了个比喻，现在的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有点像30年代的国民党军队，把我们的农村根据地团团围住，企图消灭我们。如果我们再不采取正确的方针奋起反击“敌人”的“围剿”，将无立足之地。这仅仅是一个比喻而已，可能不很确切。但是，这个比喻所指的实质，江泽民同志已作出明确的说明。1989年8月21日，他在全国组织部长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腐败现象的蔓延，严重破坏了党和群众的联系，而且成为国内外敌对势力颠覆我们的借口。”“反腐败斗争是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

与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作斗争，当然要紧紧掌握政策，严守法纪。因为实际情况确很复杂，社会上也有坏人会乘机捣乱，如同去年春夏之交那场政治风波所展示的那样。但现在主要的问题，还是在于纪律松弛，执法不严，在法律面前又不能平等对待。是斗争还是团结，是严格还是宽容，不但在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中会有区别，即使在同类矛盾中也要考虑量的不同，而给以不同的处理、对待，这是领导者应该掌握的。过去片面强调斗争哲学，一斗就过火，不该斗的也斗，教训很深刻。近几年来，在有些事情上往往又走到另一个片面，是非不分，该斗的也不斗了。这难道不是社会风气在一些地区、一些单位、一些时候坏到了乌烟瘴气地步的一个重要原因吗？

最后我们还要说到的是，县市领导学习焦裕禄，上级领导怎么办？按照我们党过去的规矩，就是越是上级应该要求自己越严。我们在这里提一点希望：地区一级、省市一级、中央部委一级的领导人，都能认真读一读二十六位县级领导人所提出的学习焦裕禄精神的倡议，不把它看成形式主义的“具文”（只有上级不认为它只是号召一下，装个门面，加以检查和督促，它才不会流于形式），而把它作为一面镜子，对照一下自己的行动和思想，凡符合的就坚持，并进一步提高；凡不符合的就下决心改进。人民群众和广大干部希望党政机关的各级领导人，从上而下，做出良好的表率，把学习焦裕禄的活动在全国普及，提到一个新的高度。过去常说干革命搞建设要“高屋建瓴，势如破竹”，现在提倡学习焦裕禄精神，就要有这样的决心和勇气，抓紧抓实抓好。

回顾毛泽东关于防止和平演变的论述

逢先知

经过去年春夏之交在我国发生的动乱和北京发生的反革命暴乱，以及去年秋冬以来一些社会主义国家所发生的动荡，回顾一下毛泽东关于防止和平演变的论述以及与此有关的其他思想，是很有必要、很有意义的。

毛泽东的晚年，在指导思想上犯有“左”的严重的错误，最终导致“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关于这个问题，在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已经作了结论。这一《决议》是完全正确的。今天我们需要在这一《决议》的指导下，对毛泽东晚年的一些思想作具体分析：对于其确实是错误的，应当坚决予以抛弃；对于其经过实践检验证明确实是正确或基本正确的，则应当继承、借鉴；对于其一些正确与错误交织在一起的，则要加以分析，吸收其正确的部分，剔除其错误的部分。毛泽东关于防止和平演变和其他有关问题的论述，就是应当很好地加以研究和学习的问题。

(一) 关于防止和平演变问题

当美国的杜勒斯刚一提出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和平演变的战略，毛泽东就敏锐地觉察到这个问题，抓住这个问题，首先是向党内的高级干部，尔后又向全党、全国人民进行教育，提高人们对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将采用对社会主义国家搞和平演变的警惕性。根据现在查到的材料，毛泽东最早提出这个问题是1959年11月，那是在他召开的一次小范围的会议上，他印发了杜勒斯的几篇演说，内容都是讲和平演变的，要大家看一看。他说：杜勒斯讲他们要以什么“法律和正义”来代替武力。又说“在这方面极为重要的是要认识到，在这种情况下，放弃使用武力并不意味着维持现状，而是意味着和平的转变”。和平转变谁呢？就是转变我们这些国家，搞颠覆活动，内部转到合乎他的那个思想。美国它那个秩序要维持，不要动，要动我们，用和平转变，腐蚀我们。毛泽东还特别讲到，杜勒斯搞和平演变在社会主义国家内部是有其一定的社会基础的。

1964年以后，毛泽东把防止和平演变问题正式提上了日程，并提出应采取的一系列的实际步骤。大家都知道，他在1964年6月16日的讲话，就专门讲到这个问题。他说：帝国主义说，对于我们的第一代、第二代没有希望，第三代、第四

代怎么样，有希望。帝国主义的话讲得灵不灵？我不希望它灵，但也可能灵。从这次讲话以后，在不同的场合，向着不同的对象，他又多次讲这个问题。他警告人们说：我们国家也不太平，还有贪污分子，投机倒把分子，还有被和平演变的危险。

从50年代末60年代初毛泽东提出防止和平演变问题，到现在已过去整整30年了，这30年的历史充分证明，毛泽东提出这个问题，是极其重要的，是很有远见的。

历史事实就是这样，当帝国主义者动用武力打败社会主义国家的企图遭到失败的时候，他们就改变策略，企图用和平演变的方法达到消灭社会主义的目的。他们实行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渗透，用资产阶级的腐朽的价值观来影响我们的人民，特别是影响青年一代，并在社会主义国家内部寻找和培植代表他们利益的人，即那些所谓持不同政见的人，以及那些反对派。他们特别注意在共产党内部寻找他们的这样的代理人。应当看到，国际范围内两种社会制度的对立和斗争，和平演变和反和平演变的斗争，将是长期的。只要帝国主义存在，他们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和平演变的阴谋就不会停止，企图最终实现其消灭社会主义的美梦。在这一点上，他们是绝对不会改变的；因此，我们在思想上也绝对不能含糊。我国在今天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的条件下，对于和平演变的危险需要更加警惕。还要看到，当国际形势发生了新的变化的情况下，他们除了采用经济制裁手段，对我国施加压力以外，还会日益加紧对我国推行和平演变战略。我们必须有充分的思想准备，要在任何情况下，矢志不渝地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列宁的帝国主义论的基本理论并没有过时。同过去一样，最终支配资本主义国家的仍然是垄断资本、金融寡头，而且它们已由一国的发展成为跨国的。二次大战以后，殖民地国家纷纷独立，但是资本帝国主义国家对原来是殖民地的第三世界，实行资本输出、经济压榨这样一个根本状况，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世界的固有矛盾并没有消失。还应当看到，帝国主义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和平演变，在一定条件下，也可以转变为非和平的、暴力的形式。因此，我们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学会运用和平的与非和平的两手，对付他们反社会主义的两手。

防止和反对和平演变，坚持社会主义制度，保卫社会主义人民共和国，是长期的历史任务，是几代人的任务。我们应当对全党和全国人民，特别是青年，进行这方面的教育，同时应当采取相应的措施。

(二) 关于警惕党内特别是领导层出修正主义的问题

首先应当说明，毛泽东在60年代提出警惕中央出修正主义的时候，他对当时党内状况的估计是错误的，他所说的修正主义，其含义也是含糊不清的。他将修正主义这个概念的外延不断扩展，把许多不是修正主义的东西也叫作修正主义，

甚至把一些属于马克思主义原理和社会主义原则的东西，也当作修正主义来批判，搞乱了思想。但是，对这个问题应当采取分析的态度。如果我们研究一下毛泽东有关这方面的言论，可以看出，他往往把修正主义同资本主义看作是一回事，例如他说：修正主义分子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修正主义就是资本主义的东西。他在1964年同一个外国代表团谈话时，说得更明白，他说：“什么叫修正主义？就是资产阶级的思想、政治、经济、文化。”如果把修正主义理解为主张走资本主义道路，那末，毛泽东把警惕党内特别是领导层出修正主义，作为一个战略思想，作为一个重大的理论和实际问题提出来，不能不说是很具有预见的。外因总是通过内因起作用。资本主义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搞和平演变能否得逞，最后还是决定于社会主义国家内部的因素，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共产党特别是它的领导层是否坚持马克思主义。毛泽东60年代的预见，在80年代末被证明了。正如毛泽东所强调指出的：领导人、领导集团很重要，许多事情都是这样，领导人变了，整个国家就会改变颜色。（1965年8月的一次谈话）鉴于国际国内的教训，现在党中央特别强调，党的各级领导班子，从中央到地方，必须掌握在忠于马克思主义的人手里。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

还有一个反对党内腐败现象的问题。毛泽东历来十分注意这个问题。从1944年印发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要全党学习，引以为戒，到1949年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警惕糖衣炮弹的攻击，到解放初期发动“三反”“五反”运动，都是为了防止和反对党内的腐败现象。所以，在50年代，我们国家政风比较清廉，社会风气也比较好。人民对这一点是满意的。60年代在部分农村和少数城市基层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在“左”的思想指导下进行的，但是它对解决干部作风问题（其中包括腐败现象），改善党群关系起了一定作用。毛泽东一贯坚持不懈地同党内的腐败现象，诸如贪污受贿、以权谋私、官僚主义等等，进行不调和的斗争。他同这些丑恶现象是不相容的。毛泽东这方面的论述值得我们认真学习。

我们相信，只要我们党是坚强的，始终不渝地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实行正确的政策；党的自身又是健全的，密切联系群众的，那末，我们党就能顶住来自任何方面的敌对势力加给我们的压力和腐蚀，防止和平演变，我们党就能立于不败之地。相反，如果党不能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不能健全自身的肌体，消除腐败现象和脱离群众现象，那末，那些反对社会主义的势力，就必定利用我们党的弱点，利用党与群众之间的矛盾，煽动制造动乱，以达到颠覆社会主义的罪恶目的。这方面的教训是十分深刻的，一定要牢牢记取。

（三）关于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问题

中国在去年春夏之交发生的动乱和反革命暴乱，是意识形态领域中资产阶级

自由化长期泛滥的结果。自由化思潮从1979年初召开的理论务虚会上就已露端倪，同时出现了“西单民主墙”。从那以后，在这10年中间，虽然邓小平同志多次提醒要理直气壮地宣传四项基本原则，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但是，由于党的个别主要领导人未能坚持实行邓小平同志的意见，对自由化思潮制止、斗争不力，表现软弱退让，甚至纵容和支持，结果，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思潮一浪高过一浪，最后终于导致动乱和反革命暴乱。

毛泽东曾经说过：“凡是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新的历史实践进一步证明了这一论点的正确性。我们要维护和巩固人民民主政权，必须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去占领思想舆论阵地。同样，那些搞自由化的人，妄图颠覆社会主义制度的人，也是拼命企图占领思想舆论阵地，为他们的夺权阴谋做准备。社会主义国家的一些持不同政见者，总是先从意识形态方面着手，大造舆论，宣传资本主义的民主、自由、人权和资产阶级的价值观，攻击和否定马克思主义，丑化社会主义制度。而帝国主义对社会主义国家搞和平演变，也特别重视从思想文化方面进行渗透。有一种现象值得注意，就是反社会主义的阴谋，常常从学术理论问题开始，进而逐步发展成为政治问题，再进而形成有组织的政治反对势力。在中国是这样，在有些社会主义国家里也是这样。

这里有一个怎样正确处理学术理论问题与政治问题的关系的问题。是不是可以这样看：这两者之间既有区别，又有联系。不把它们加以区别，用对待政治问题的方法，对待学术理论问题，是错误的。我们过去在这方面犯过错误，不应当重犯。因为，这样不利于甚至会扼杀理论学术的发展。同样，如果看不到它们之间的联系，对理论学术问题放任不管，任凭错误的、有害的学术观点自由泛滥，也是不对的。有些看来似乎是纯学术理论问题，如人道主义、异化问题、价值观问题等等，但如果在这些方面任凭资产阶级观点泛滥，那就会起腐蚀作用，逐步从根本上动摇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要正确处理好这两方面的关系是一件比较困难而复杂的工作，绝不要简单化。在这里，重温一下毛泽东下面的一段话，是很有益处的。他说：“毫无疑问，我们应当批评各种各样的错误思想。不加批评，看着错误思想到处泛滥，任凭它们去占领市场，当然不行。有错误就得批判，有毒草就得进行斗争。但是这种批评不应当是教条主义的，不应当用形而上学方法，应当力求用辩证方法。要有科学的分析，要有充分的说服力。教条主义的批评不能解决问题。”（《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怎样对待“双百”方针的问题。这里有两种截然相反的态度：一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就是通过百家争鸣，发展马克思主义，巩固和扩大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阵地；另一种态度是自由化的态度，他们也抓“双百”方针的旗帜，大作文章，其真正的目的却是为了宣传自由化的观点，来攻击、否定马克思主义。正如毛泽东所说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两个口号，就字面看，是没有

阶级性的，无产阶级可以利用它们，资产阶级也可以利用它们，其他的人们也可以利用它们。所谓香花和毒草，各个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也有各自的看法。”《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所以，毛泽东在提出“双百”方针的同时，又提出判断我们的言论和行动是非的六条标准，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这两条。在今天，六条标准，特别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坚持党的领导这两条，仍然是判断人们言论和行动的标准。可是，在一个时期，六条标准成为一些人集中攻击的目标，说他们会扼杀学术理论的发展，束缚人们的思想等等。这正是自由化的观点，需要加以澄清。1960年10月，毛泽东会见斯诺，斯诺说：西方报纸有许多说法，说“双百”方针政策在1957年开始执行时，是因为你们认为党的威信已经很巩固了，不会有反对的人，但运动开展后，很快就发现有许多人反对你们，因此你们就把这个运动停止了。毛泽东说：你说的一部分对，一部分不对。你说我们停止百花齐放，事实上我们并未停止。我们主张社会主义的百花齐放。我们从开始就是这样的，不是说社会主义、资本主义都可以“齐放”。毛泽东在这里是说得很清楚的。

在讲意识形态问题的时候，不能回避毛泽东的错误。他把意识形态领域中的问题看得过于严重，把“文革”前17年间我党领导下的文学、艺术、戏剧、电影、美术等方面的工作成绩几乎全盘否定，对一些无害的，甚至是优秀的作品以及文艺界的一些代表人物进行了错误的、过火的批判。这种批判又扩大到哲学、经济学、历史学、教育学等各个学术领域，并且把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强调到过分的程度，这些都是错误的，一定要纠正，这是毫无疑义的。但是，吸取过去的教训是为了更好地让马克思主义占领思想阵地，而不应该走向另一个极端，放弃思想阵地，对意识形态的工作放任不管。我们应当学习毛泽东注意意识形态工作和思想政治工作这个基本思想，把他关于意识形态问题论述中一切对的、好的、合理的东西吸收下来，剔除其错误的部分，用以指导我们今天这方面的工作。

(四) 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问题

在社会主义社会里还有没有阶级斗争？阶级斗争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状况怎样？它在社会主义社会的诸矛盾中占有什么地位？阶级分析的方法还灵不灵了？这些都涉及马列主义的重大理论问题，涉及社会主义的重大实践问题。毛泽东在他的晚年几乎用主要的精力，根据中国的实践，并借鉴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艰苦的探索，在探索过程中走过了曲折的道路。他在这个问题上，既有重要的贡献，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理论财富；又有严重的失误，导致阶级斗争扩大化，以至发动“文化大革命”，给国家带来灾难性的后果。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我们应当采取科学的态度加以冷静的分析，从中吸收有益的东西，作为指导我们前进的思想武器，同时抛弃错误的东西，避免重犯过去错误。

毛泽东研究了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中国社会的状况，认为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这个斗争的内容主要是两条道路的斗争，即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这个斗争是长期的；在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他指出，要好好地认识这个问题，研究这个问题，要提高警惕，不然的话，我们这个国家还是会走向反面，即走向资本主义。如果我们麻痹大意，资产阶级就会夺取政权，搞资本主义复辟。他特别强调要教育青年。他说：现在我们的年轻人不知道过去的困难，没有经过阶级斗争的锻炼，要靠老一辈的人把过去经历告诉他们，对他们进行教育。（1963年同一个外国代表团的谈话）在经历了去年我国发生的政治动乱和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发生动荡之后，再来重温毛泽东的这些话，使人感到亲切。历史的发展已经证明而且还将证明，毛泽东的这些话是对的，尽管有个别提法还值得研究。

社会主义国家内部的阶级斗争，总是同国际上的阶级斗争互相联系、互相呼应的。千万不能忽视国际上的阶级斗争对社会主义国家内部的影响。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的战略，就是国际阶级斗争的重要形式。毛泽东在讲国内的阶级斗争的同时，也讲国际上的阶级斗争，常常把这两者并列地提出来。例如他在1958年《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里就曾说过：“现在一方面有社会主义世界同帝国主义世界的严重的阶级斗争；另一方面，就我国内部来说，阶级还没有最后消灭，阶级斗争还是存在的。这两点必须充分估计到。”说国内阶级还没有最后消灭，这是不确切的，但他提醒人们要充分注意国内和国际上都存在着阶级斗争，则是十分重要的。

毛泽东在社会主义社会阶级问题上的主要错误是：对国内阶级斗争的形势估计得过分严重，把阶级斗争扩大化；在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经消灭之后，仍然把阶级斗争和两条道路的斗争看作是社会主义社会整个历史阶段的主要矛盾，从而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错误理论。这些，无疑是应当抛弃的。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批判和纠正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把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确立了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政治路线，这是完全正确的，应当毫不动摇地坚持下去。但是，由于前几年只批判“以阶级斗争为纲”，而不讲或者很少讲阶级斗争，谁一提阶级斗争问题，谁就被认为是搞“以阶级斗争为纲”。更有甚者，连运用阶级分析方法讲中国革命的问题，也有人给扣上“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帽子，可见思想混乱到何等程度。在这样的舆论空气下面，使得一些人阶级斗争观念十分淡薄，甚至丧失了阶级斗争观念，以至于在去年那场动乱中，看不清这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而迷失方向，发生动摇，甚至站错立场。例如，有的人认为，只要政府再让点步，答应学生的要求，承认学生的错误行动是爱国民主运动，承认“高自联”合法，事情就可以圆满结束了。这样的愿望尽管是善良的，但却是天真的。他们不懂得，只要党和政府再退让，动乱的煽动者必然提出进一